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台湾政治

纵览

高民政 著

全面介绍台湾政治模式
的权威著作

华文出版社

台湾政治纵览

高民政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政治纵览/高民政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0.1
ISBN 7-5075-0996-6

I. 台… II. 高… III. 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台湾
IV. D6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6729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 (010) 83086667 (010) 8308685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海宏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27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序一

王邦佐

读了高民政同志的“台港澳政治”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台湾政治纵览》一书，甚为高兴。

我之所以感到高兴，首先是因为此书是在世纪之交面世的一部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著作。

1999 年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辞旧迎新的世纪之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更是一个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1999 年 5 月 4 日，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80 周年纪念日；7 月 1 日，既是中国共产党的 78 岁诞辰，又是香港回归祖国两周年的纪念日；10 月 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50 周年大庆；12 月 20 日，则是中国人民迎接澳门回归祖国的大喜日子。1999 年，真可谓是在中国人民在告别 20 世纪，迎接 21 世纪到来之际的一个丰收年和喜庆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全国 12 亿多人民所心系的台湾问题的研究成果，实在是令人高兴的。

众所周知，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十分

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港澳问题的解决，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将更加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于是，海内外各界人士迫切希望了解“一国两制”和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于台湾政治模式的历史演变、现实状况及未来前景的兴趣更是与日俱增。虽然近年来分别介绍台湾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已有一些，但把台湾政治模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并将其成果介绍给读者的著作尚不多见。而港澳台政治模式特别是台湾政治模式又恰恰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模式中不可分割且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因此，《台湾政治纵览》一书的出版，就具有了适应形势需要或者说具有了某种填补空白的作用和意义。

《台湾政治纵览》一书，除了系统阐述“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内容和意义的“导论”之外，主要分析了台湾政治的演变及现状，体系宏大，结构严整，资料翔实，行文流畅，史、制、论兼顾，而且对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因此，本书既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学术价值，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无论对于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教学，还是对于从事港澳台工作和统战工作、宣传工作的同志，以及海内外对“一国两制”和港澳台问题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是，高民政同志的《台湾政治纵览》一书，弥补了我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方面的一个缺憾。

长期以来，美国等国家的政治学之所以绵延不绝、大家辈出，是因为其政治学者享有良好的研究环境和研究条件。而这些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是中国政治学者所没有

的。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体系模式，而且正在自觉地不断改革和完善着这个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模式。其中“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及其实践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政治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模式，这既为中国政治学者提出了理论总结和指导实践的要求，也为确立中国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中应有的地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遇。20年前邓小平同志英明地指出，政治学研究多年被忽视了，要赶快补课。当时我正值壮年，在张友渔、石啸冲等老一辈政治学者的带领下，满怀责任感和使命感进入了第一批补课者的行列。多年来，我虽然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作了较多的研究，培养了一些以当代中国政治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并较早地发表过数篇有关“一国两制”理论的论文，但却未能写出一本系统地研究和分析港澳台政治的书，这不能不说是我政治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遗憾。因此，当我看到我在复旦国际政治系任教时的学生高民政同志写出这本《台湾政治纵览》一书时，心里感到由衷的喜悦，也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因为我作为老师未能实现的一个愿望，现在通过学生的努力出色地实现了。基于此，当高民政同志要我为此书作序时，我就欣然同意了。

我之所以感到高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高民政的书使我欣喜地联想到，一批年轻有为的政治学者成长起来了，中国政治学的持续发展后继有人了。

二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发出“赶快补课”的号召时，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从事政治学教学研究的人才尤其是年轻的政

治学人才特别缺乏。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政治学人才缺乏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年轻的政治学者脱颖而出，成为当今中国政治学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有些人进入了党和国家的各级政治决策咨询部门，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发挥着积极的影响作用，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学发展乃至中国的政治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一向提倡年轻人要有所创造，有所发展，也很高兴地看到活跃在当今中国政治学教学科研领域以及党政部门的许多学生学有所成，干有所成。高民政同志也是近年来在政治学领域崭露头角的众多年轻政治学者之一。因此，为他的新著《台湾政治纵览》一书作序，也是表达我支持和鼓励年轻人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和政治发展而发奋努力的一种态度。

完全不必否认的是，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而言，目前政治学界年轻的、能够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的人才仍然比较少。我想借此机会，寄希望于年轻的政治学者：为了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学的进一步繁荣，为了在世界政治学殿堂里争得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相应的大国地位，去努力拼搏，茁壮成长！我相信，这个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1999年12月8日

序二

浦兴祖

高民政教授所著《台湾政治纵览》，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发展规划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的一个阶段性、相关性成果。

由我主持的国家“九五”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拟系统地研究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各项主要政治制度从正式确立到曲折发展，从严重挫折到恢复、健全的历史进程及其重要启示。预期的最终成果是一部多卷本的专著。课题组的各位同仁深知此项工作很有价值、也很有难度，正克服种种困难，在承担各自学校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同时，尽力收集资料、分析思考，并经常相互切磋、共同探究。

在此过程中，课题组成员不断推出一些阶段性、相关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发表有关的学术论文。而高民政教授推出的则是《台湾政治纵览》一个系列著作。高民政教授长期执教于空军政治学院，在政治学等领域发表过不少研究成

果。九十年代初，又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在由我开设的学位课程《当代中国政制专题研究》的讨论中，他多次轻声细语却颇有见地的发言曾给我留下过较深的印象。一九九二年夏，他又拿来厚厚一大叠书稿，要我审读由他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后由黄河出版社于1993年3月出版，获学界好评），实际上是让我成了这部大作的第一位读者，使我深感这位青年学者在中国政府、政治、政治制度诸方面的研究中肯下工夫、能出成果。故在申请国家“九五”重点课题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民政应当成为课题组的一员主将。事实上，近三年来，他与全组成员一起，付出了相当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项在我们自己看来是“浩大工程”的研究课题得以正常展开、稳步推进。

不言而喻，“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制度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政教授在原先积累的部分资料基础上，结合“九五”课题的总体要求又进一步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并开展了初步的梳理与研究，使这部分的内容显得相对成熟起来。考虑到总课题成果的最终面世尚有时日，民政与我商量后决定，先将这部分内容作适当调整、润色后独立成书出版。

现在正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二十七万言的《台湾政治纵览》书稿，系统全面地介绍与阐释了台湾当局政治体制的由来与变迁，资料翔实、分析到位、文字流畅，可读性强。相信会给一切关心中国统一大业的人们，提供大量有价值、有兴味的信息与启迪的。遵民政教授所嘱，写下以上文字，聊作序。借此，还要祝愿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继

续繁荣昌盛，祝愿台湾问题早日获得解决，祝愿祖国统一大业最终实现。

1999 年底于复旦中心村

序三

李孔怀 阮国英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怀抱。1999年12月20日，澳门又回归了祖国。

可是，这一时刻的到来，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半世纪。

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葡萄牙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侵占了香港和澳门，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但是，也是从那时起，百余年来，香港、澳门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所争所求的，就是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因此，近百年史，她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被侵略、宰割、凌辱的时代已经结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洗雪民族百年耻辱。抚今追昔，每一个中华儿女无不从心底涌起

一股热流，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我们繁荣、富强、统一的国家，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迫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由于当时国民党集团的倒行逆施，已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踞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的隔离状态。因此，港、澳的回归，台湾的统一，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是摆在我国领导人案桌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本着照顾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高屋建瓴之势，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它是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一国两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基本国策。它的提出，把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前途同我国长期发展的战略和祖国的统一大业联系了起来。

我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和台湾的统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告台湾同胞书》，叶剑英的“叶九条”的发表，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谈判，中英、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澳门基本法的制定，江泽民总书记《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对台工作讲话的发表，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筹建，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表明我国政府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和一贯立场。它得到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积极响应和坚决拥护。

台湾政治纵览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高民政教授多年来教学、研究台、港、澳问题的成果，全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一国两制”和台湾问题作一全面的阐述和介绍。本书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体例上颇有新意，也是我所见到的一部全面介绍台湾政治的著作，相信它会给海内外人士提供一个全面了解“一国两制”和台湾问题的机会。

总的说来，这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业书籍，同时，它对一些现实问题也作了回答，因此它既适合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可作为一本教材，也对从事对台、澳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同志，以及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广大干部和读者，提供一部理想的读物。所以，我们乐于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也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深信，在人类 21 世纪，一个统一、民主、富强、文明的中国，一定能够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99 年底于复旦大学

导 论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的国家统一战略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虽然是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提出来并在中国付诸实践的，但它又是在当今时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与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相关联，牵涉到有关国家的利益和关系，并且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的统一问题特别是统一前后港澳台的政治模式问题，就不能不首先对“一国两制”这个关于国家统一的战略构想进行重点考察。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①

1. “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萌芽的

所谓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台湾与祖国大陆相统一的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与大陆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但是，由于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都同属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共同的历史文化，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从而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1949年台湾人为地与大陆分开，违背了中华民族利益和愿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实现台湾与祖国的早日统一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实现祖国统一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虽然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和平统一的条件，但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和努力却一直没有减退。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第15次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7月30日，周总理又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重申：“在中国人民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页。

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应该说明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

1956年1月13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对台方针和政策，特别指出：“凡是愿意回到大陆访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过去他们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去台者，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这就意味着把蒋介石包括在内的台湾高层人物也作为团结对象，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使用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提法，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3月16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周恩来让他们传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主张和谈，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们赞成和谈。”周恩来特别强调指出，未来统一后“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1956年6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不仅重申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而且进一步阐明了具体政策：第一，本着“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原则，对于“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

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并“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及给予“适当的安置”。第二，“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也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商谈。”第三，“欢迎台湾同胞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第四，对台湾的军政人员“到大陆考察”、“探亲访友”，“提供协助、方便”，“保证他们来去自由”。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首次提出了举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对台方针也为同年9月召开的“八大”所肯定。10月间，毛泽东在会见有关朋友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但这些和平倡议没有得到台湾国民党的积极响应，反而造成1958年的两岸炮战。

1958年10月6日，以国防部名义发表实际上出自毛泽东手笔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再次建议同台湾当局“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25日，国防部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从长商议。”

195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首次